

# 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 的民族主义诠释<sup>\*</sup>

谢立忱 黄民兴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国内层面讲，民族分离主义往往会诱发相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从国家层面讲，边界领土问题与中东民族主义自身的发育情况、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以及民族主义思想与传统观念的格格不入等因素密切相关。从超国家层面讲，泛民族主义不仅容易导致国内族际冲突的外溢，而且容易引发与现存主权国家体系的冲突，由此产生边界领土纷争。

**关键词** 中东 边界领土 纠纷 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谢立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

中东国家间普遍存在边界领土纠纷。迄今为止，相当一部分争端仍悬而未决。从国家的族性来讲，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主要包括：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纠纷和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纠纷，以及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纠纷 3 种类型。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主权要求、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关于中立区的争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阿曼和沙特间关于布赖米绿洲之争、巴林与卡塔尔间的法什特迪贝尔珊瑚礁主权归属之争。此外，阿联酋与卡塔尔，沙特与科威特、卡塔尔等国之间也有类似的争端。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争端主要有：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爱琴海之争，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等。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争端较为激烈：埃及、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均不同程度地存有边界领土争端，尤其是叙利亚与以色列间的戈兰高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间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及耶路撒冷等争端更为棘手；伊朗与伊拉克、阿联酋等国之间分别存在着阿拉伯河和胡齐斯坦争端，以及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海湾三岛等争端；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存有伊斯肯德伦纠葛等。

影响边界领土争端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民族主义是个重大因素。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重视尚显不够，笔者拟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此问题加以诠释。

## 国内层面的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

民族分离主义是引发或加剧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不仅与国内主体民族主义的膨胀有关，而且同民族自决权等民族理论的滥用也有联系。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战后亚洲主要国家间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中期成果。

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基本的国家形态，构成民族国家的可以是单一的民族结构，也可以是较为复杂的和十分复杂的多民族结构。<sup>1</sup>事实上，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民族国家中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不存在纯粹的公民或种族国家，各国都展现了一种公民和种族成分的混合，即便西欧国家所谓的公民民族也是建立在国内主导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基础上的。<sup>④</sup>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实现各族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均质化”的过程，但在运作中，各国往往注重加强主体民族的权力，强调主体民族主义的构建。所谓主体民族主义，即指多民族国家内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讲，主体民族主义的构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民族属性甚至持续存在，主体民族主义的构建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方面。

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及相关国际协定，为欧洲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致力于使各国国界与民族疆域重合的民族国家模式。<sup>④</sup>此模式成为新独立中东国家的构建者们所追求的理想模式。然而，中东各国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对这种单一民族国家模式的推崇，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体民族主义的过度膨胀，致使民族国家权力行使的均质性要求受到挑战，进而造成族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巨大裂痕。“国家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中实际一般是以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在很多时候难免以忽视其内部的少数民族为代价”<sup>Ⅳ</sup>，因而各种“次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有这么快乐的一天，它们将要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sup>Ⅴ</sup>。主体民族主义过度膨胀极易导致次民族主义勃兴，一旦这种次民族主义与特定的领土相联系，就会催生地方分离主义，并招致外来干涉，进而造成或加剧相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纷争。两伊领土争端中的胡齐斯坦问题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历史上，胡齐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激烈争夺的地区，称“阿拉伯斯坦”。1925年伊朗出兵占领该地区，并从此改名为“胡齐斯坦”，至今仍是伊朗的一个省。在该省，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但他们在就业和升学等方面备受波斯主体民族的歧视，对此，阿拉伯人极为不满，不断提出民族平等与自治的要求，从而为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拉克的干涉提供了契机。<sup>Ⅵ</sup>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一直坚称“胡齐斯坦”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积极支持当地阿拉伯人脱离伊朗的反政府斗争。

另外，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也同两国主体民族主义的膨胀有密切关系。1922年希土战争后，土耳其将境内约150万希腊人遣返回希腊，而居住在希腊境内约50万土耳其侨民亦一概被遣返回土耳其。<sup>⑧</sup>不过，土耳其仍有不少希腊族人，希腊也仍有很多土耳其族人。因此，这种做法看似有助于消除希土两国历史上的隔阂，实则强化了两国的主体民族意识，导致主体民族主义的过度膨胀。如1942年11月土耳其开始实行一种针对希腊族等非穆斯林征收财产税的法律<sup>⑨</sup>，自1964年起，土耳其还实行一种禁止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族人变卖自己财产的法令<sup>⑩</sup>；1988年，希腊高等法院批准了一项法令，即禁止用“土耳其”这个词描述希腊穆斯林<sup>10</sup>等等，不一而足。尤需指出，拥有许多希腊族居民的伊姆罗兹（Imvros）和特涅多斯（Tenedos）两岛之所以成为希土爱琴海争端中的一个焦点，与土耳其的这种大民族主义政策不无关系。根据《洛桑条约》这两个岛屿归属土耳其，但岛

<sup>1</sup> 参见宁骚著：《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sup>④</sup> See Taras Kuzi,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23.

<sup>④</sup> 参见[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sup>Ⅳ</sup> 朱毓朝、茹东燕：《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第5页。

<sup>Ⅴ</sup> [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sup>Ⅵ</sup> 参见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sup>⑧</sup> 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1页。

<sup>⑨</sup> See Ioannis A. Stivachiti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Non-Offensive Defence in the Zone of War: the Greek-Turkish and the Arab-Israeli Cas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p. 70.

<sup>⑩</sup> See Peter Calvert, *Border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of the world*, London: John Harper Publishers, 2004, p. 313.

<sup>10</sup> See Ioannis A. Stivachitis, op. cit., p. 55.

上希腊族居民仍拥有自治等特权。<sup>①</sup>然而,土耳其不仅剥夺了希腊族人的自治权,而且夺去了他们大量的可耕地,并禁止教授希腊语(1951~1963年除外)。<sup>④</sup>总之,长期以来,希土两国一直相互指责对方歧视和迫害少数民族,从而使这一问题与两国边界领土争端形成恶性影响。<sup>④</sup>

如果说主体民族主义的膨胀成为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一个现实根源,那么,民族自决权则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政治民族主义主要思想内核之一的民族自决思想曾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的产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在多民族国家形式流行的今天,民族自决权却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进行分裂国家活动的理论支撑。他们高谈“民族自决至上”,无视历史和现实,肆意歪曲和滥用民族自决权的原始意义,声称“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可以凭借其民族自决权来建立本民族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不能以任何其他的原因加以限制。”长期困扰两伊和土耳其等多国的库尔德问题就与滥用这种民族自决权有关。库尔德族是中东第四大民族,主要聚居在两伊、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交界处。长期以来库尔德人一直为自治和独立而斗争,该问题因此成为影响有关国家关系的一个突出跨界民族问题。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同,加之美、苏等外部势力插手,因此,库尔德问题不但恶化了两伊等有关国家间关系,而且可能会引发或加剧这些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

总之,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常常与族际冲突等其他问题相互交织。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双刃剑”功能,“它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sup>④</sup>。当主体民族主义过度膨胀,国家内聚力与合法性不足,国族与族群之间存在分离的张力,以族群为依托的民族主义即“族群民族主义”便会要求摆脱其现存的国家而寻求创建新的国家,进而对所在国家产生解构和分离作用,并引发或加剧相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

## 国家层面的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

就国家层面来讲,民族主义对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一) 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诉求

民族主义,作为西方文明传播的一种客观产物,是自20世纪初以来影响中东历史进程的最活跃、最持久的因素之一。其基本政治目标是建立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民族国家。伴随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经过两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至20世纪70年代最后形成。随着独立国家的纷纷建立,国家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中东各国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民族主义,是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它是相对于国内民族主义和跨国家、跨地区的泛民族主义而言的,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方式”<sup>⑤</sup>。国家民族主义主要把政治效忠对象限定在领土国家范围内,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国家的建立必然意味着边界确定和领土划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sup>⑥</sup>尽管现代民族可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想象不是凭空的,正是政治地域为想象提供了具体的空间。根据吉尔·德拉诺瓦

<sup>①</sup> See Ioannis A. Stivachtis op. cit., p. 71.

<sup>④</sup> See Ibid

<sup>④</sup> See Peter Calvert op. cit., p. 313.

<sup>④</sup> 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8页。

<sup>⑤</sup> 李兴:《国家民族主义情结,文化民族主义焦虑——评塞缪尔·亨廷顿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精神面临的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5期,第66页。

<sup>⑥</sup> 参见王建娥、陈建樾等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Gil Delannoi) 对民族国家起源的阶段与顺序的划分, 一个民族国家为强化自身得连续经历 4 个阶段。<sup>1</sup> 其中, “确定边界, 并在此边界内控制居民的活动及内部与外部的交易” 是第一阶段, 若一个民族国家不能控制领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注定是短寿的。<sup>④</sup> 具体来讲, 边界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扮演着 4 种关键性角色: 首先, 边界有利于形成易于区别 “我者” (我国) 与 “他者” (他国) 的共同体观念; 其次, 边界有助于捍卫民族文化尤其是曾受殖民压制的文化和语言; 再次, 边界是新独立国家的一种象征和符号; 最后, 边界确定了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sup>④</sup> 鉴于边界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战略作用, 中东各国领导人自独立伊始便把明确国界、维护领土完整作为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一个重要事项。于是, 各国间边界领土纠纷的发生便不可避免。

然而, 精确地限定领土主权范围的线形疆界是一种现代欧洲概念, 并不为西方文明传入前的中东人所知晓或认同。只是在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东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后, 把人们的普遍认同或民族认同和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关系才成为一种正式的政治诉求。因此, 民族主义对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首先体现为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其次表现为对民族国家主权、领土等要素成长的影响。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各国获得主权、领土、综合国力等民族国家要素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 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一种客观结果, 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严格地说, 任何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形态都不会单纯地表现为其政治、文化和经济取向, 而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取向的结合物。<sup>⑤</sup> 但是, 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内容及利益取向的侧重点确有不同, 因而依此可大致将民族主义划分为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3 种形式。因此, 各国间领土争端体现的不仅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还包括文化上尤其是经济上的诉求。随着中东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族主义的经济取向日益突出, 以那些有争议地区为依托的自然资源, 例如石油资源和水资源等自然成为有关各方争夺的对象, 边界领土问题因此突出。资源问题被视为中东边界领土争端的一大诱发因素。1990 年伊拉克出兵科威特被称为是一场石油资源争夺战, 而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1965 年 “六五” 战争和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都与水资源有密切关系。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促成或加剧了有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沙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多数属于资源主导型的领土问题。

## (二) 现代国际关系理念与传统观念的冲突

中东民族主义与西欧那种自身孕育的、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的。因此, 以领土完整、人民主权、国家主权等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理念与真主主权、“乌玛” 认同、“圣战” 思想等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和国际关系理念, 以及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显得格格不入, 这成为产生边界领土纠纷的一个重要观念因素。在强调 “认主独一” 的伊斯兰政治哲学中, 一切权力、权威和权势均归真主, 真主是整个世界的宰主。这种主权观念是否定国家主权的真主主权论。根据伊斯兰传统观念, 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体, 应建立一个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共同体 ( “乌玛”, 即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基于伊斯兰教的这种 “乌玛” 认同与民族主义体认的民族认同存在尖锐对立。另外, 穆斯林有义务对异教徒发动战争的 “圣战” (吉哈德) 思想也是伊斯兰传统观念之一。 “圣战” 被认为是实现 “乌玛” 的途径, 是历史上伊斯兰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根据伊斯兰传统观念, 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部分, 即穆斯林统治的 “伊斯兰家园” 和非穆斯林统治的 “战争家园”。 “圣战” 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异教徒控制下的 “战争家园” 转变

<sup>1</sup> 参见 [法国] 吉尔·德拉诺瓦著; 郑文彬、洪晖译: 《民族与民族主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65~66 页。

<sup>④</sup> 同上。

<sup>④</sup> See Taras Kuzia op. cit., pp 101-102.

<sup>⑤</sup> 参见刘中民、左彩金、骆素青著: 《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73 页。

为实施真主法律的“伊斯兰家园”。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俗化逐渐成为中东地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民族国家等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但上述伊斯兰传统观念仍有一定的活力和土壤。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则把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向高潮后，各种传统伊斯兰观念再度复苏。真主主权、“乌玛”和“圣战”成为各种激进伊斯兰组织和成员极力提倡的口号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些传统观念显然对现代民族国家等观念构成了巨大挑战，成为引发或加剧边界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由于中东许多民族曾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现代民族国家同与国家相关的边界领土概念对他们来讲，相当淡漠。因此，至今仍残存的部落意识，也是影响中东边界领土问题的传统观念因素之一。

### （三）中东民族主义发育不良

中东民族主义，至少在最初意义上，属于一种反抗运动，其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建设性的，代表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回应。一旦获得独立，这种缺乏民众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活力便很难继续。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早发展社会的民族主义相比，前者对政治合法性构成更大的挑战。<sup>①</sup>中东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知识精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换言之，中东民族主义倾向于首先在社会上层中产生，然后自上向下灌输，属于精英型民族主义。它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夺取或通过谈判掌握国家政权的一种运动，与那种全社会性的共同利益感显然不是一回事。<sup>④</sup>而且，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东地区出现时，中东许多国家的领土范围已被西方殖民者划分完毕。因而，当法定的领土界线在民族认同观念出现之前被确定时，这个国家更有可能包括那些全异的、甚至相互敌对的语言、宗教和种族的群体，而这往往成为边界领土纠纷产生的内部根源。而且，即便独立后，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仍具有明显的精英性。因此，与西方“发育正常”的民族主义不同，中东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先天不足，从而使各国独立后长期面临文化整合、合法性等难题。因而，一些国家为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内聚力，故意加剧边界冲突，转移民众的视线。战争和冲突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中起重要作用，因为它们要求民族团结、征兵和一致对外。<sup>④</sup>

## 超国家层面的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

中东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因为本地区一些民族分散于跨地区的地缘和历史、文化缘由，从而体现为诸多泛民族主义类型。<sup>⅔</sup>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东几大民族（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都曾建立过帝国。这种帝国传统有助于培植这些民族的强烈种族共同体意识和超国家观念。一般认为，“当民族主义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宗教共同体、传统文化共同体、语言或语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地理单元的基础上，形成联盟、邦联、联邦甚至统一的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泛民族主义。”<sup>⅔</sup>泛民族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国家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的衍生物或派生物，是族性在国家层次之外的一种宏观构建。<sup>⅔</sup>泛民族主义不仅容易导致国内族际冲突的外溢，而且易于引发与现存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冲突，从而产生边界领土纠纷。

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及大波斯民族主义都属于泛民族主义，其中，泛阿拉伯主义对边界领土争端的影响最为显著。泛阿拉伯主义是战后盛行于阿拉伯世界的

<sup>①</sup> See Mostafa Rejai and Cynthia H. Enloe “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e 1969, p. 150.

<sup>④</sup> See *Ibid.*, p. 152.

<sup>④</sup> See Taras Kuzia *op. cit.*, pp 9—10.

<sup>⅔</sup> 参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sup>⅔</sup> 宁骚著：前引书，第90页。

<sup>⅔</sup> 参见王希恩：《族性及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第4页。

一种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属于阿拉伯人领土在内的统一阿拉伯国家，一直是泛阿拉伯主义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因此，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顺理成章地认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领土。尽管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是大国强权和狭隘民族主义结合的产物，但泛阿拉伯主义无疑是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相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讲，正是阿拉伯各国对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高度笃信和对阿拉伯责任的积极承担，从而造成了多次阿以战争，进而在阿以间形成了大量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领土纷争。前两次中东战争，实际上也是泛阿拉伯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sup>1</sup> 第三次中东战争也与埃及迫于阿拉伯世界主战呼声和出于对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感，而再次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封锁亚喀巴湾和积极备战等有密切关系。不过，这次战争后，由于阿拉伯国家战败，泛阿拉伯主义逐渐式微，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转而上升。

另外，泛阿拉伯主义与大波斯民族主义的对立，还造成或加剧了阿拉伯与伊朗间的领土争端。在泛阿拉伯主义者看来，伊朗胡齐斯坦省是阿拉伯人不可分割的领土，应改为阿拉伯斯坦，海湾也应改称阿拉伯湾，两伊间的阿拉伯河与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等海湾三岛均属于阿拉伯人。伊朗民族主义始终具有大波斯情结，尤其当伊朗实力增强时，这种情结更明显。与阿拉伯人针锋相对，大波斯民族主义者坚称胡齐斯坦、海湾三岛属于伊朗领土，同时尽力争夺阿拉伯河主权，极力维护海湾的波斯性。由于双方立场各异，这些领土争端尤其是伊朗与阿联酋间的海湾三岛问题仍未解决。

此外，泛民族主义极易导致漠视国家主权，并造成对国家利益空间的超现实界定，为滋生侵略扩张欲望提供肥沃土壤，而极端民族主义是当今领土问题尖锐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的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战争都与伊拉克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过分追求有关，是伊拉克采取局部统一向阿拉伯全面统一的渐进方针的具体体现。<sup>④</sup> 萨达姆意在通过这两场战争夺回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的海湾三岛和胡齐斯坦，以及历史上曾作为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个县的科威特。另外，泛民族主义还有助于强化散布于各国的同一民族，尤其是处于少数民族或劣势地位的同族人否定所在国疆域的意识 and 回归母国意识，导致族裔冲突的外溢。“在亚洲和非洲，族裔冲突大部分在国家内部发生，而在中东，它却是跨国家的。”<sup>⑤</sup> 族裔冲突的外溢往往引发国家冲突和争端。如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和伊朗的阿拉伯人便不同程度地有这种回归或独立意识，这是造成希腊与土耳其、伊朗与阿拉伯国家间领土纠纷的一个因素。

泛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的派生形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内涵。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曾指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因为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发展问题连到了一起，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sup>1/4</sup> 因此，伴随国家民族主义的不断攀升，主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泛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民族利己主义面前必定愈益暗淡无光。然而，这些泛民族主义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时隐时现，仍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些泛民族主义超越国家，以领土、民族等为基础的“族性”构建，虽不足以改变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既有的世界格局，但深刻地影响着这种格局，威胁着民族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对国家的构建和解构功能无疑是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形成的重大因素之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东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仍将存在。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赵 苹)

<sup>1</sup> 参见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sup>④</sup> 参见赵克仁：《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探析》，载《阿拉伯世界》，2000年第3期，第28页。

<sup>⑤</sup> F. Gregory Gause III “Systemic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1 Spring 1999, p. 27.

<sup>1/4</sup> 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 **The Nation and Religion in Turkey**

——Revision of Secularism Reform of Kemal

*Bi Jiankang*

pp. 38– 44

The core of the secular reform of Kemal was national control of religion. This reform extremely enhanced national control of religion, but the reform dominated by elites didn't reached social edges and masses. The nation identity of Turkey has double dual structures of centre– edge and nation – religion for its special feature as a frontier country and dual identities both as a European and Moslem countries, so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te and religion in Tur-

key is very complicated. Islam is the internal character of the country of Ottoman– Turkey and European is the external and secondary character. As we regard Islam as the internal feature of Turkey country,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continuities of the frustrated reform of secularization, also, it is not hard to explain the rising strongly of the Adalet ve Kalkim Partisi (AKP)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ecular reforms in Turkey.

## **A N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Conflicts of Territory of Frontier in Mideast Countries**

*Xie Lichen & Huang Minxing*

pp. 50– 55

National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frontiers conflicts between Mideast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domestic causes, national splittism will usually cause to occur territory disputes amo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auses, issues on frontier territory have close relations with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ism, desir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f nationalism and contrac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traditional ideas. In terms of super – states, pan – nationalism can make internal national conflicts outward, and leads to conflicts with existing sovereign state system, so that brings out frontier and territory disputes.

## **Assessment on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Kenya**

*Shu Yunguo & Zhang Huijie*

pp. 56– 61

After the independence, tourism industry in Kenya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initiation, development, readjustment and promotion.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tourism industry in Kenya has formed its special characters focused on watching wild animals, attracting more international tourists other than domestic visitors,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travel. Tourism industry has not only created

large amount of foreign incomes for economic growth, provided with man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mproved people's living level, but also improved 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promo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ason of the success of developing tourism in Kenya depend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for a long time, positive promotion by government and its advantage tourism items.